

保护和拯救农业科技人才的健康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Agricultural Skilled Personnel

杨俊杰

(武功农科中心协委会 陕西杨陵农科城 712100)

一、科技人才极不正常的早逝现象

现代世界上一些享有盛名的有识之士认为：一个国家的荣誉，首先系于两方面人的身上，一是领导层即政治精英，一是知识层即科技精英，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地位和形象怎样，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往往如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得好：不重视科技人才，就等于灭亡。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圣西门当年有两个假说：一个是法国突然损失了 50 名优秀化学家、50 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 名优秀的数学家、50 名优秀的军事工程师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再一个是法国如果不幸失去了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等军政要员，也并不会使国力大减。经长期的历史验证，就是如此。

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要靠科技英才推动。人才是国家的栋梁，是知识和技术的载体。科技人才的个体素质包含三个方面，即业务素质、思想素质和“本钱”——身体素质，真正要有所作为就是要靠“本钱”和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又是首位，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无法使出本领、发挥才智和作出奉献，然而，我国却普遍存在着极不正常的科技人才“本钱”丧失和早逝现象。

大量的调研统计资料和报道材料表明，我国科技人才早逝的高峰期是 50~60 岁这个年龄段，而峰值则在 55 岁左右。1988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对我国 11 个省市 20 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中的 3 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调查，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为 58.52 岁，平均患病率高达 61%，其中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人的两倍多。湖北省 1988 年对 7 个城市 35~55 岁知识分子情况的调查表明，从 1985 年~1988 年，被调查单位共死亡中年知识分子 1 204 名，占这些单位同期知识分子死亡总数

的 63%。1988 年对西北大学和西安交大近一年半来 60 岁以下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病逝统计，平均逝龄只有 51.89 岁。据《光明日报》1990~1992 年 3 月刊出的高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逝世的消息，共 72 组 452 人，其中 60 岁以下的 365 人，约占 80%。清华大学 1994 年对 2 056 名教职工体检，发现 35.2% 患有疾病，其中一位在体检中发现肝癌的副教授病逝时年仅 51 岁。北京大学 30~60 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近几年每年都有 20~30 人病逝。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 616 人体检，就有 513 人出现异常；数学所高级知识分子中 71.71% 的人患有高血脂；计算机所 90% 的女性患有乳腺增生，50% 以上女性还患有其它妇科病。一份对北京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追踪 10 年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该区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 90 年代初反而比 80 年代降低了。有的专家曾对我国各类人员的死亡人数按年龄分布情况，作了直方图。结果表明，除知识分子外，其他各类行业人员的死亡年龄分布正常，即随着年龄增大，死亡人数增多；而科技人员、教员、干部的死亡年龄分布不正常，越是出成果、出效益年龄段的科技人才，其死亡率越高。

二、农业科技人才的健康更令人堪忧

农业科技人才有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的劳动大多数是智力兼体力型的，研究的对象是生物科学，服务的主体是农民。尤其是农业推广人才在农忙收获季节，与农民整天耕耘在“露天工厂”里，“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小病不哼，大病硬撑”的忘我劳动，极易积劳成疾。

据对陕西杨陵农科城的调查，获国家发明和自然科学奖的主持人患冠心病的占 67%。陕西省农科院和陕西林科所，1988~1989 年的行政和中高级科技人员病故情况统计表明，因患癌症和心血管症病逝的 12 人中，平均逝龄行政人员为 58.3 岁，而中级科技人员竟为 50.8 岁，要比全国当年人均寿命

69岁,早逝18.2岁。1990年5月西北水科所对50岁左右和有高血压病史的中老年科技人员及其他骨干人员103人进行了微电脑普查,结果正常的和基本正常的只有29人,单项血小板聚集率增高者24人,不正常者50人。

最近笔者对杨陵农科城的陕西省农科院、西北农大、中科院西北水保所、西北林学院和陕西省农校等5个农业科教单位1993~1994年15名病逝科教人员统计,除3人外均因患癌症或心血管病死亡,平均寿命为58.6岁,比杨陵区1994年人均寿命男性68.47岁,女性69.72岁,分别少9.87岁和11.12岁,比全国人均寿命70岁相差11.4岁。笔者今年2月赴延安地区调研农业科技队伍情况,该区的农业高级人才的早逝问题更为严重,1989~1995年元月病逝人员的平均寿命仅为54.66岁,十分令人震惊!有的中级农业科技人才痛心地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工作担子重,生活负担大,收不敷出。我们为了事业‘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也是血肉之躯,怎能不感到物价上涨等因素对生活 and 健康的威胁!”。

农业中高级科技人才过早地染病和英年早逝,其原因是多种的。从生理上讲,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才能与身体、创造与健康之间的矛盾最尖锐并易激化;但主要的是:长期处于野外作业,工作担子重且超负荷,劳累过度;工资福利待遇差,营养不良;“人态环境”欠佳,后顾之忧多,心情不舒畅;医疗保健差与缺乏文体活动。如陕北某县农技中心体改后被“半断奶”,只发给农技人员月工资额20~50%,迫使一位老农技员只得靠拾破烂和卖老鼠药,恹恹度日;陕西省农科院至今因医疗费超支拖欠职工医疗费达260万元,又何谈保健身体呢?

三、采取应急拯救措施, 保护农业科技人才健康

鉴于上述情况,呼吁国家尽快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应急拯救措施。

1. 引导科技人才注重脑力劳动卫生,不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在当前人才硬、“软”环境欠佳,尤其是“人态环境”复杂的情况下,科技人才必须特别注重自己的脑力劳动卫生,采取多样“净化”措施。要自觉地排除干扰和烦恼,保持心情舒畅。要爱护身体,多学自我保健知识,注意防病健身、生活规律化。有病要及早治疗,严防中年科技人才的悲剧——“过劳死”的发生。应懂得劳累过度是导致“英年早逝”的普遍诱因的哲理,注意劳逸结合,舍弃“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

预防医学告诉我们,引起疾病有3个条件,即

致病因子、社会背景和“宿主”(即患病病人的自身因素)。只要这3个条件有一个不成立,人就不会得病。对科技人员自身来说,病因和社会两个条件不好控制,唯一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行为。

科技人员在控制自己的行为中,要特别注重“体力投资”,提倡多在“健康银行”积蓄,从长计议,不要在自己的“健康银行”里过份透支,在现有生活水平下,健康支付要做到收大于支,最低也要做到收支平衡。每当身体不舒服向自己发出警报时,就要放下工作及时就医和进行科学休整,在日常生活还得从“加、减、乘、除”具体做起,即加——合理增加营养,增加保健活动;减——适当放慢节奏,劳逸结合,不宜提倡加班加点,带病坚持工作;乘——努力扩大交往,陶冶友谊,学会适应各种环境;除——彻底清除烦恼,学会从最坏的可能来思考问题,保持稳定、良好的情绪。

2. 有关部门和各级党政领导,要切实关心农技人才的身体状况,不能只停在口头上、搞花架子,要为他们的身心健康拨付必需的费用

这方面可作的事很多,如全额报销疑难绝病的医疗费;拿出一些钱购置文体和健康器材;坚持和恢复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高级人才每年一次到旅游胜地休息度假和体检;办理就医的“医疗特约证”或“优诊证”;一般医疗费用的适当补助;建立中高级人才的个人健康档案等;但近年来,由于全国上下的财政“饥饿症”、“贫血症”,国家不予报销或仅补助一部分,致使人才所在单位有关经费,在“下放”、“改革”的名义下名存实亡了。应扩大政府特殊津贴的比例和补助金额度,对农业人才更加优惠些。应考虑解决农业专家学者长期呼吁的问题:工资待遇应比同期其他行业人员提高1~2个档次;实行农龄津贴;对连续从事农业年满30年以上的农技人才实行医疗免费;退休时享受100%的退休金;象对待教育、医疗、财会人员那样颁发给“荣誉证书”。如广东省中山市早就规定:对连续工作满25年的农技人员在退休时发给一次性奖金;高级人员5000元,中级人员4000元,初级人员3000元;子女就业国家统筹解决;购房更加优惠,等等。这些作法也有利于预防人才转行、“跳槽”和流失,更好地稳定队伍。

3. 尽快建立健全法规和实施“阳光工程”

广大农业科技人才认为,现行的一些制度、办法、规定、条例都是“软”的,立法才是硬的,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法规,如制订《农业科技人才保护法》等。靠法制驱动,使对农业科技人才“适度倾斜”的政策硬化。我国现在有了拯救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近年来科学家们呼吁尽快建立面对科技人才的“阳光工程”,设立专用基金,加大对科技人才的资助额度。

(下转第6页)

青年科技工作者没有发言权,给予他们展现才华的机会太少。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很深。老师在场,学生不敢说话;老师不牵头,文章就发不出。李远哲先生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曾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李远哲如果是在台湾,我可以断言,他是不可能获诺贝尔奖的。”李远哲教授说:“我在美国 30 年,学会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与人平等相待,所以我与学生讨论问题也是完全平等的。”这话说得多好啊!海峡两岸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长期以来,受这种“历史包袱”的影响,我们的科技界一直没能形成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风气,没有形成尊重中、青年科学家的创造力的观念,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其实,在这方面,老一辈科学家已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苏步青先生就是一例。我们应该向全社会广为宣传“苏步青效应”,使科技界,包括全社会都形成尊重中、青年科学家创造力的意识。

诺贝尔精神崇尚求实。科学研究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劳动,科研成果是否具有科学性,必须经过实验的检验。诺贝尔奖的发放,一般都在科学发现之后十几年,为的是让科学实验有足够的时间去检验科学创新的成果。尽管如此,诺贝尔奖仍然有错误发放的案例。1926 年和 1923 年的生理医学奖,经实践证明都错了,或部分错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后来也承认并更正了此种错误。诺贝尔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德行,在科学史上再一次留下求实精神的佳话。

诺贝尔精神提倡献身。科学家没有献身精神,是断无成就的。为科学,波义耳终身不娶;为科学,开普勒终生受穷;为测量子午线长度,法国科学家米兴牺牲在战火之中;为观测罕见的“金星凌日”现象法国天文学家被迫流浪在印度荒野;为揭示铀核裂变现象的规律,美国科学家哈里成了第一个死于射线的学人,等等。诚如马克思所言,科学的入口处,犹如置于地狱之口。

作为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活动,诺贝尔奖巨大的荣誉感把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科学才子,不分国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统统团结在“为理想而献身”的旗帜下,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献身。

在当今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精神力量能像诺贝

尔科学精神那样,通过社会的科学能力和技术能力调动整个地球的科学智慧,震撼整个国家的中枢神经,唤起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去参与世纪之交的国际竞赛。正因如此,一项严肃的诺贝尔奖往往又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或一个国家的荣誉感。正因如此,美国的总统曾多次毕恭毕敬地向诺贝尔人才敬礼,前苏联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向诺贝尔人才授勋,波兰人民曾经以全民游行的方式欢呼自己的民族英雄。提倡诺贝尔精神,决不能忽略其历史的正义感和人民性。正因如此,居里夫人曾经用包含祖国名字的拉丁字母来命名她发现的镭元素,丁肇中用汉字“丁”的变体“J”来标记他发现的新粒子。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大物理学家卡皮查在获奖时曾说过“我们科学家,首先是爱国主义者和自己祖国的公仆”的话。那么,我们就完全理解,为什么科学巨匠杨振宁,在许多场合下,都骄傲地把自己的诺贝尔荣誉同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联系起来。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诺贝尔精神同奥林匹克精神一样,既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又都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或者说,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最先进的民族意识。它虽然不象奥林匹克大会那样,把国旗冉冉升起,但是它却把民族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历史荣誉柱上。实际上,当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走上领奖台时,他们的心中都没有忘记,他们的荣誉之中寓渗着父母和祖国的养育之恩,包含着先辈和同行们的智慧接力。他们自己只不过是成千上万个“为理想而献身”的英雄中的极少数代表人物。他们的业绩标志着人类“向科学进军”的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已经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抛到了太平洋里,它使中华民族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扬眉吐气。但是,建国 46 年来,“诺贝尔科学侏儒”的帽子仍然扣在我们的头上。这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炎黄子孙,无不在心灵的深处投下一块阴影。我们的同胞都应明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倡爱国主义,仅仅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是不够的,只有同时弘扬诺贝尔科学精神,繁荣我国的科学事业(尤其是把基础科学搞上去),中华民族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技术殖民主义的压力。让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站在“诺贝尔试金石”面前,来看看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深还是浅吧!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 14 页)

保护农业智力资源,促使农业科技人才健康长寿的关键,是要在全社会以至人才所在的单位里努力创造出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农业科技人才的大环境和“小气候”,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

位,改善不平等的舆论待遇。这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责任编辑 王宏章)